

“失去的营”从地狱归来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



战俘和他们自制的捕捉老鼠的笼子。

“鸽子行动”特战小组从东方八所解救出的澳大利亚籍战俘都是盟军“海鸥支队”的成员,1945年8月,这个当年被澳大利亚新闻界称为“失去的营”,在失去音讯将近4年后,被成功营救,一时在澳大利亚引起巨大轰动。

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特别报道

本版照片为本报资料图片

65年前的8月27日,代号为“鸽子行动”的特战小组,从海南东方八所解救出被关押在此的荷兰籍、澳大利亚籍战俘。

这个当年在澳大利亚新闻界被称为“失去的营”的“海鸥支队”,在他们失去音讯将近4年后,被成功营救,一时在澳大利亚引起巨大轰动。正在海口筹备“纪念东方空降65周年图片展”的澳大利亚人布兰登,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了一张拍摄于1945年的照片,照片显示的是当这些战俘从海南回到墨尔本时,人们争相走上街道,庆祝他们的归来。

八所战俘来自“失去的营”

布兰登告诉记者,在八所的澳大利亚籍战俘是“海鸥支队”的成员,这支部队成立于1941年,大多数成员来自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和维多利亚,还有一些是1940年加入的志愿者。“海鸥支队”的编制有1131人,任务是加强在安汶岛的防御。

安汶岛是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南部的一座小岛,二战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。

当时安汶岛是荷兰东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,它被认为是日本袭击澳大利亚前的一个重要基地。同时,安汶岛还拥有丰富的天然橡胶和石油资源,这些资源对当时的日本来说,也是极其需要的。

1941年底,日本为争夺远东殖民地,独霸亚洲,发动了太平洋战争。此时,驻守在安汶岛上的盟军部队主要由澳大利亚与荷兰的军人组成。

当时,澳大利亚负责指挥“海鸥支队”的军官是史考特中校,而与澳大利亚部队并肩作战的军人中,荷兰人居多,其余是当地的岛民等。

“因为两支军队在沟通过程中语言的障碍,以及武器之间的差异等原因,造成了指挥作战方面的不顺畅。”布兰登告诉记者,在武器装备方面,当时荷兰的子弹是不适用于澳大利亚枪械的。

负责掩护的力量不够,高射炮数量有限,本来有望抵御日军的支援飞机也在战斗开始前被召回,使得安汶岛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。

登岛作战前,日军对安汶岛实施空中打击,不断轰炸重要目标。1942年1月30日,日军对安汶岛的作战全面爆发,拥有武器优势和兵力优势的日军很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

据布兰登介绍,在保卫机场的战斗中,229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放下武器后被日军杀害。原来人数为1131人的“海鸥支队”士兵,800多人成为了战俘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有关“海鸥支队”的消息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中,在澳大利亚新闻界,这支部队被称为“失去的营”。

从安汶到海南

半年后,500余名生病的安汶战俘,被告知他们将

被送到一个条件较好的营地。布兰登根据海鸥支队成员的回忆说:“10月初,有消息传来,所有的病人和受伤者,将会乘坐轮船去红十字会营地,在那里,他们被告知将会得到充足的食物,和相应的娱乐活动。”

布兰登提供的资料显示,当时,在海南的日本军官写信给驻扎安汶的日军指挥官,请求他派出272名澳大利亚人和272名荷兰人到海南岛工作。而安汶的日军指挥官,只输送了不合适的人员到海南,这其中还包括乐队的成员。

此时,在中国的海南岛,日本人悍然侵占中国的领土,开始了对海南长达6年的统治和掠夺。战争给海南造成了极大的创伤。

历史学者、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说,“日军对海南岛的侵占,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,日军希望通过占领海南岛,一方面达到扼杀中国抗战的目的,另一方面也企图通过掠夺海南岛的热带资源及矿产,达到其‘以战养战’的目的。同时,日军也力求通过其对海南岛的经营,使其成为日军进一步‘南进’的战略基地。”

从1939年2月10日,日军完成在海南岛北部的登陆,实现了其第一个战略目标,即强化对华的海上封锁。同时,日军也加紧实施对海南岛的资源掠夺。

“补充矿产等资源是日军在海南岛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项目,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不断扩大,其岛国物资缺乏的弱点也就日益暴露。紧迫的铁矿需求,使得日本人要加快对海南石碌铁矿的建设。”张兴吉分析。

与此同时,日本人加紧了海南石碌地区的全面勘探,加紧修筑道路、搭建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,张兴吉说:“1941年3月,日本人在香港招募了约1000名劳工,4月到达八所,投入铁路工程建设。9月又从上海招来3000名劳工,由于缺乏必需的生活条件,艰苦的劳动,劳工死亡率较高,不少人逃走。在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况下,海南急需大量劳工的输入。”

在此背景下,500余名来自安汶的战俘踏上了前往海南岛的旅程。布兰登说,这500余名战俘大概于1942年10月乘坐极其简陋的日本“太鼓丸号”轮船出发,战俘们被关在甲板之下。货舱几乎没有空间可以躺下,甲板下也没有通风口,战俘只有在日落时才被允许到甲板上呆一个小时。就这样,战俘们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了三个星期,他们于1942年11月5日到达东方八所,战俘们也称之为“地狱之船”。

在笼子里的日子

最初,这批来自安汶的战俘被带到海南时,是为日本人开发岛上的资源。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,日本军官就对他们发表了演讲。

布兰登说,当时日本军官对战俘们讲:“现在日本正在建立新亚洲,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。既然你们已经投降,停止了对日本的敌对行为,你们就不再是我们的敌人,所以你们不用担心,就在这里做好你们的事情。”

很多战俘在被关押期间都秘密记日记,布兰登在澳大利亚找到了这些日记。从澳大利亚人Walter Leslie Cooke的日记中,我们可以体会到战俘所经历痛苦和绝望:

6月16号星期六

“下午下雨。真想回家跟你们在一起。这里的生活糟透了。日复一日。真希望快点见到你们。每过一天我们就靠近一点。好了,得去找点吃的了。”

7月20号星期五

“如果能再吃到我们自己的食物该多好啊!都不敢想象!我敢肯定连我们的狗都不愿意吃我们现在吃的东西。有七块石头那么重!”

读到这些日记的人,能真切感受到战俘对国家、家人的思念。这些战俘不能写信给家人,除了宣扬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战争的消息外,几乎得不到别的消息。对这500人来说,他们与世隔绝,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死活。

布兰登告诉记者,在对战俘的研究中,他认为幽默和乐观,对生存是至关重要的。为了鼓励士气,战俘们经常会举办讨论会和音乐会。会在不同的时间,让不同的人进行不同主题的讲座,比如银行学、旅行、赛跑、救火、火山以及别的话题。而那支由28人组成的战俘乐队,则有18人死在了海南。

在被囚禁的日子里,日本人提供给战俘的只有一只牙刷、一块肥皂、一双袜子以及一床蚊帐。在八所战俘营,战俘们最大的威胁是食品与药品的极度匮乏。

布兰登提供的澳大利亚战俘Bill Aitken在向军事法庭所做的报告里写道:“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之间,总共有2430人进入医院。”

布兰登说,医疗设备极其缺乏,日本人发的医疗器械只有两只针筒,四个体温计,一把旧剪刀以及两根缝合伤口的针。因为没有石膏,断了手脚的伤员不得不用金属或木板来固定。虽然在附近有一家设备良好的日军医院,但日本人从来不提供检测血液或小便。整个战俘营也只有有一个医生Bill Aitken,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医生!战俘们被救之后,Aitken就去世了。很多同伴都认为,Aitken医生是伤心而死,他目睹了太多的人死去,而他却无能为力。

“由于食物匮乏,战俘们饥不择食,甚至连老鼠都抓来吃。几乎每个人都有个捕鼠器,把抓来的老鼠跟从花园里种的洋葱、土豆一起煮来吃,这在战俘们看来,味道跟炖牛肉一样。”布兰登说,“荷兰战俘的食堂同样糟糕,吃的东西都变质了,每天只好靠极少的米饭度日,外加蜗牛、青蛙、蜥蜴、蛇、老鼠,任何看起来能吃的东西都被用以充饥。而日本人送的肉通常是又黑又脏,医生嘱咐大家不要吃。”

战俘们还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,据布兰登介绍,最惨的一个小组是负责在沙滩挖洞,这些洞要挖到大得能装下两间屋子。每天晚上,战俘都得用手推车把断手、断脚或断脑袋的人推回去。这些人很快就会死去,有时,每周都要埋掉两三个人。



患有“干型脚气”的战俘。



2名战俘喜气洋洋地迎接营救人员。